

胡适精品集

胡

信心与反省

胡適



主编 / 胡明

光明日报出版社



胡适在著书。

胡适



胡适与长子祖望一家（媳曾淑昭、孙胡复）。

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適





目 录

辨伪举例

——蒲松龄的生年考	(1)
《醒世姻缘传》考证	(11)
后记一	(64)
后记二	(65)
附录一:柳泉蒲先生墓表(张元)	(66)
附录二:跋张元的《柳泉蒲先生墓表》(胡适)	(69)
附录三:《醒世姻缘传》序(徐志摩)	(75)
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	(90)
跋《四游记》本的《西游记传》	(103)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	(108)
《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	(113)
 我们走哪条路	(125)
附录一: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梁漱溟)	(139)
附录二:答梁漱溟先生(胡适)	(150)
《王小航先生文存》序	(153)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156)
信心与反省	(164)
再论信心与反省	(171)
三论信心与反省	(179)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186)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192)
领袖人才的来源	(199)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 ——答孟心史先生	(205)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210)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216)
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	(221)
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229)
大众语在那儿	(236)
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240)
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246)
论《春秋》答钱玄同	(250)
附录：钱先生来书	(252)
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254)
谈谈《诗经》	(261)
附录：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	(271)
论《诗经》答刘大白	(274)
附录：刘大白先生来书	(276)
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	(278)
明成祖御制《佛曲》残本跋	(283)
读王小徐先生的《佛法与科学》	(285)
《参同契》的年代	(289)
朱起凤《辞通》序	(294)

赵万里《校辑宋金元人词》序	(303)
董康《书舶庸谭》序	(307)
《人权论集》序	(311)
《四十自述》自序	(313)
介绍我自己的思想	
——《胡适文选》自序	(316)
中国中古思想小史	(333)

辨伪举例

——蒲松龄的生年考

卢见曾的《国朝山左诗抄》卷四十五有蒲松龄小传，引张元的《蒲先生墓表》说：

卒年七十六。

张元的《墓表》全文，我那时没见着。鲁迅先生的《小说史略》根据《聊斋文集》附录的《墓表》，说蒲松龄至康熙辛卯始成岁贡生，越四年遂卒，年八十六（一六三〇——一七一五）。后来我见着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聊斋文集》（以下省称“石印本”），果然有张元的《墓表》，说他

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一七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八十有六。以本年葬村东之原。又十年，为雍正改元之三年（一七二五），其孤将为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属余。

以余于先生为同邑后进，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辞而为之文以表于墓。

张元于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作《渔洋感旧集》后序，自署“八十一岁老人”，是他生在康熙十一年（一六七二），蒲先生死时，张元已四十四岁，作《墓表》时他已五十四岁了。他记蒲松龄死的年月日，决无不可信之理。

但《山左诗抄》引《墓表》作“卒年七十六”，道光《济南府志》（卷五四）也作“卒年七十六”。然而石印本《聊斋文集》所录《墓表》却作“享年八十有六”。究竟是那一本是对的呢？

《山左诗抄》刻于乾隆戊寅（一七五八），去张元之死（一七五六）不过两年。卢见曾刻《渔洋感旧集》，张元替他补各人的小传；《山左诗抄》屡引张元所作的碑传，所以我们可以断定卢见曾所据的《蒲先生墓表》，必是张元的原本，应该是最可信的本子。因此，我相信“八十六”是“七十六”之误。从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上推七十六年，是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庚辰。

去年十月我到北平，借得清华大学图书馆所藏的《聊斋全集》（以下省称“清华本”），其中有《文集》四册，《诗集》两册。《诗集》中有《降辰哭母》诗，中有云：

老母呼我坐，大小绕身旁。……因言庚辰年，岁事似饥荒。尔年（尔字此本作“儿”，后见马立勋抄本作“尔”，尔年即是那一年）于此日，诞汝在北房。……

庚辰正是崇祯十三年，可以证明七十六岁之说不误。

《文集》中有《述刘氏行实》一篇，是他的夫人的小传。刘孺人死于康熙癸巳（一七一三），年七十一；她生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比蒲松龄小三岁。她死时，蒲松龄年七十四岁，《诗集》中有七十四岁的诗，次年七十五岁，有过妻墓的诗。以后就只有几首诗了，最末一首为《除夕》，仍有悼老妻的话，大概是七十五岁除夕的诗。《诗集》里没有七十五岁以后的诗。这也可证聊斋先生死时大概是七十六岁。

淄川马立勋先生（北大学生）不信七十六岁之说，他说，《聊斋诗集》里有《八十述怀》七律两首，诗中明明说“甲子重经又廿年”，他决不止七十六岁。此两诗不载于清华本，止见于石印本。

马君自己在淄川抄得一部《聊斋全集》（以下称“马本”），其中的诗集里也没有这两首《八十述怀》诗。这一点使我很怀疑。

今年我又借了清华本，准备用此本来和马本和石印本互相参校，先请罗尔纲先生把三种《聊斋集》的文，诗，词的篇目列为一个对照表。罗君把这表写成之后，来对我说：“石印本的文和词，除了极少数之外，都是清华本和马本所收的。最奇怪的是石印本的诗，共二百六十二首，没有一首是清华本和马本里面见过的。”这就使我更怀疑石印本的《聊斋诗集》了。

昨夜我取出了石印本的《聊斋诗集》，翻出了那两首《八十述怀》来细细研究。第一首全是泛泛的话，可以不论。第二首如下：

甲子重经又廿年，健全腰脚胜从前。论交差喜多名士，著

胡适精品集

录新成只短篇。

春到东菑催力作，夏长北牖傲高眠。恬熙幸际承平日，与世无求便是仙。

我看出破绽来了，第五句有一条小注：“淄东有薄田数十亩。”我笑道：“这首诗是妄人假作的。蒲留仙决不会用‘淄东’来注解‘东菑’！”

于是我又细细翻读全部诗集，看见集中有许多聊斋的朋友的姓名，如王渔洋、王西庄、袁宣四、李约庵、焦石虹、毕公权、毕怡庵、邱行素、张历友……等等，每人都注有名号，籍贯，科举年分，官阶，著作等等。这些人确都是聊斋的朋友，注的又这样详悉清楚，我如何能说这部诗集是假造的呢？

我看下去，又发现了两件极有力的证据，真把我吓倒了！第一件是两首《己未除夕》的诗，有“三万六千场过半”“五十知非蘧伯玉”两句，都是五十岁的话。己未是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依七十六岁的说法，聊斋那时只有四十岁。如果他那年已五十岁，他应该是崇祯三年（一六三〇）生的，死时八十六岁。岂不是八十六岁之说对了吗？

还有一件证据，是一首用苏东坡《石鼓歌》韵的长诗，诗题是

戊寅仲夏，时明府将赴沂州任，同人以诗赠者皆用坡公《石鼓歌》韵，予辞不获，因亦勉成一首，并送毕韦仲之黔，刘乾庵入都，沈燕及往九江。

这个诗题已够吓人了。诗中又有一条小注，说

龄今年六十八矣。

戊寅是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依七十六岁说,他只满了五十八岁。如果他那年满六十八岁了,那么,他的生年应该提早十年,死时正是八十六岁了。

我看了这两条吓煞人的证据,很懊悔不该瞎疑心这部石印本诗集。我想,我的七十六岁说只好抛弃了。我请我家中住的胡鉴初先生(他正在研究蒲松龄的全部著作)来看这两条硬证,我说,“我认输了。”他也情愿承认八十六岁的说法了。

可是,清华本和马本的《降辰哭母》诗中说的生年在庚辰的话,又怎么讲呢?难道“庚辰”是庚午(一六三〇)之误吗?这一个字的证据,怎么能抵敌那石印本的许多证据呢?

我的心终不死,忽然想起了《聊斋文集》里那篇刘孺人的《行实》,——这是三种本子同有的。《行实》说:

孺人刘氏,……父季调,……生四女子,孺人其次也。初松龄父处士公敏吾……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松龄其第三子,十一岁未聘(此依石印本。清华本及马本皆作“十余岁”),闻刘公次女待字,媒通之。……遂文定焉。顺治乙未(一六五五)间,讹传朝廷将选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汹动。刘公……亦从众送女诣婿家,时年十三。……

我看了这一段,又忍不住大笑了。我指给鉴初看,又翻开年表,我说:“刘孺人生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是毫无可疑

胡适精品集

的。如果蒲松龄的生年要提早十岁,那么,他十一岁正当崇祯十三年(一六四〇),他的妻子还没有出世哩!她怎么会‘待字’呢?”

这一条新证据足够打倒石印本的那两条证据了。于是我对鉴初说:“‘石印本’的诗集全是假造的,所以没有一首诗和清华本或马本相合。这位假造的人误信了那《墓表》的一个误字,深信聊斋活了八十六岁,所以假造那三首假诗,一首《八十述怀》,一首《己未除夕》,一首《戊寅仲夏》。这个人真了不得。他做了二百六十二首假诗来哄骗世人;许多诗是空泛的拟古之作,如《拟陶靖节移居》,如《拟杜荀鹤宫怨》,那是不相干的。但他又查出了聊斋的一些朋友,捏造了许多诗题,又加上了许多详细的注语,这些注语都好像有来历的,所以我们都被他瞒过了。”

鉴初还有点不相信。我说:“我要把这些姓字履历的注语的娘家,一条一条都查出来给你看。”我翻出一个诗题:

喜毕公权获解

注云:

毕名世持,淄川人,康熙十七年戊午解元。

我说,“这一条注,我记得清清楚楚是《聊斋志异·马介甫》一篇的注语。”我到书架上寻出一部文登吕湛恩注释的《聊斋志异》来,翻开《马介甫》一篇,果然有这一条注:

毕公权名世持，淄川人，康熙戊午解元。

我又指一个诗题：

同毕怡庵绰然堂谈狐，时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夜也。

我说，“这个诗题也好像是《聊斋志异》上见过的。”鉴初和我两个人同翻《聊斋》，不到一会儿工夫，果然在《狐梦》一篇寻着了，原文是：

余友毕怡庵……

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

我又指一个诗题：

袁宣四得古瓶，诗以艳之。有序。

序文凡一百四十三字，叙北村甲乙二人淘井得二古瓶的始末，一瓶入张秀才家，一瓶归宣四。我说，“这篇序也像是抄《聊斋》的。”果然在卷十三寻得《古瓶》一篇，序文全是删节这一篇的。还有一条注，记袁宣四的履历，也被这位先生全采去作另一诗题的注语了。

不到一个半钟头，这“石印本”的诗题的注语差不多全在《聊斋志异》的注语里寻出来了。如李约庵和张历友的履历见于《志异》附录《淄川志》小传的注文，焦石虹的见于卷六《狐

胡适精品集

联》篇注,邱行素的见于卷十三《秦生》篇,张石年邑侯生祠事见于卷十三《王大》篇(适按,大字不误。张石年又见于《王十》篇)，“淄川古八景”的八个诗题全见于卷十四的《山市》篇的注文。——前后共寻出了十条证据,我可以下判决书了。判决的主文是：

审得有不知名的文人,抄袭了《聊斋志异》的文字和注文,并依据了张元所作《蒲先生墓表》的误字,捏造了蒲松龄和他的朋友们倡和的诗若干首,并且混入许多浮泛的拟古诗歌,总共捏造了二百六十二首歪诗,冒充《聊斋诗集》,石印贩卖,诈欺取财,证据确凿。

这案判决时,已近半夜了,我们都去睡了。今天早起,我又检查《山左诗抄》,才知道这位“被告”不但熟读《聊斋志异》,并且还采用了一些别的材料。石印本《诗集》有一篇《杖头钱》“同历友作”,并附录张历友的原作《杖头钱》,张诗收入《山左诗抄》的第四十三卷。石印本又有《赠历友》两绝句：

选政亲操日杜门，
穷搜八代溯渊源。
一编肪截传名著，
高士同教两汉尊。
山左推君第一人，
蒲轮空谷贱红尘。
相嬉猿鹤轻轩冕，
花落山房春复春。

诗后附注云：

历友学殖淹博，挥洒千言。同时诸前辈称为冠世之才，不虚也。试辄冠曹。时官定山中丞为学使，以明经荐山左第一人，就京兆试，不遇，归而处昆仑山，不复出，杜门著书，有《八代诗选》《班范舫》《五代史舫截》《两汉高士赞昆仑山房集》等书，卓然可传。岂以名位之有无为轻重耶？

这一条注文，句句有来历，都见于《山左诗抄》卷四十三张笃庆（历友）的小传下的附录。自“官定山中丞”以下到“杜门著书”，是抄唐豹岩的《昆仑山人集》序；“学殖淹博，挥洒千言”，是用《渔洋诗话》；所著书目五种是全抄卢见曾的跋语；只是《班范舫截》一个书名截去了一个“截”字。我疑心“被告”曾见过《山左诗抄》的第四十三卷的残本。

可是他决没有见着《山左诗抄》的全部。何以见得呢？《山左诗抄》卷四十五有蒲松龄的诗十一首。如果他见了此卷，他决不肯放过这十一首真诗。石印本《诗集》没有这十一首诗，可见他不曾见《山左诗抄》的全书。

我们现在可以推测“被告”为什么要捏造这部《聊斋诗集》。满清末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印出了一部《聊斋集》，其中有文，有词，而没有诗。民国以来，此书久已绝版了。大概“被告”见了这部扶轮社本，嫌他太少，就捏造了一部《诗集》，又加入了两册来历不明的《聊斋笔记》，材料增添了一倍，凑成了六册的《聊斋全集》，就成了一部定价两元的大书了。《文集》中的《志异自序》和《诗集》中的《惜余春慢》也是从《聊斋志异》抄